

“打工文学”中的“安子神话”解析

沈建阳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作为“第一代打工作家”的代表人物, 安子以个人发展的神话为“深圳梦”赋形。对于投身深圳的“追梦人”来讲, “安子神话”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诱惑, 还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生成的一套“自我的技术”。作为中国城市化重要的文学表征, “打工文学”不仅是属于打工者个人的“进城”故事, 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系列转变。在深圳完成它的“特区”功能, “打工文学”完成了自己这一阶段的使命, “安子神话”也受到了质疑。

[关键词] “深圳梦”; “安子神话”; “打工文学”; 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5-0086-07

一、引言

1980年8月26日,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中国从此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 并在短期内引发了南下打工的人口大潮——那些来自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 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涌向新生活, 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到广东去!”“到深圳去!”“到城里去!”“进城”一时成了人们心中的最强音。

最早进入深圳的主要有3类人——基建部队、辞职下海的淘金者和来自偏远乡村的打工者。与前两类人相比, 外来的打工者一不如基建部队, 他们无稳定的组织共同体; 二不如下海淘金者, 大多数人并无明确的个人规划。陈秉安的报告文学《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为我们保留了对于这一时期特区“打工妹”的鲜活记忆: 前一天刚用大巴车从井冈山革命老区带出来的打工妹, 第二天就吵着嚷着要回家, 工厂还没有开张, 人就已经走得精光^{[1]583}。特区的工厂生活意

味着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劳动纪律的习得。那些勉强留下来的“打工妹”, 因一时无法适应流水线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以至于“哭声是当时女工中流行的‘国际歌’”^[2]。在陈秉安的记述里, 当时的劳资关系并不融洽: 早期“打工妹”的自由散漫让工厂的管理者大伤脑筋, 她们常常拉帮结派、消极怠工; 而在打工者看来, 在每天繁重的工厂劳作之外, 她们还要面对“严厉的拉长”“苛刻的总管”“好色的老板”——常常被她们叫做“走狗”“帮凶”“资本家”“吸血鬼”“假洋鬼子”^{[1]570}。

1985年, 杨宏海^①调入深圳市文化局, 负责特区文化理论研究, 并接受了打造“特区文化”的重任。当时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 城市治安管理也面临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打工者, 杨宏海可谓临危受命。某种意义上, 由杨宏海等人打造的“打工文学”就是要改变打工者的“包身工”联想, 把他们打工的经历讲述成一个个成长的故事, 从而整合进他关于“深圳梦”的整体论述中。在由杨宏海推出的“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中, 安子无疑是最“平凡”的一个——没有高学历, 初中都未毕业就到深圳打工; 没有背景, 初来乍到也是

[收稿日期] 2022-09-11

[基金项目] 集美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金项目 (Q201913)

[作者简介] 沈建阳 (1988—), 男, 福建建阳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杨宏海, 广东梅州人。他于1984年从嘉应学院被引进到深圳, 并组建深圳文化研究所, 他当时接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造“深圳文化”。

从流水线女工干起；甚至没有出众的文学才能，就连安子的“伯乐”杨宏海也不得不承认“（她的）作品带着初学写作者的稚气”。可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安子，最终引发了“轰动效应”，成了“深圳梦”的代言人。其实，“安子神话”是以个人发展的神话在为“深圳梦”赋形，它就是杨宏海等人一手打造的“深圳梦”的赋形，它的背后是深圳这座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承诺。同时，对于千千万万投身深圳的“追梦人”来讲，“安子神话”不仅仅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诱惑，它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生成的“自我技术”。在安子身上，他们看到了成为“深圳人”、成为一个更加现代的自我的可能。

“打工文学”是与新时期启动的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是即将到来的城市化大潮在文学上的表征。当深圳完成它的“特区”功能，向现代大都会转型，由杨宏海等人打造的“打工文学”相应地完成了自己一个阶段的使命之后，“安子神话”也不得不受到质疑和挑战。

二、“安子神话”

和大多数奔赴深圳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样，安子从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干起，先后做过流水线插线工、餐厅服务员、制版厂工人等职业。最后因为旷工过多，被制版厂开除。可以说直到来到深圳大学夜大学习，安子的“打工文学”故事才真正开始。经同学介绍，她结识了当时就读于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客人^①。后来那句被安子传遍神州大地的口号“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就是客人竞选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时的竞选宣言。正是在客人的引导下，安子才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并开始了“打工文学”的创作：

在交谈中，我怯怯地问客人：“一个打工妹，可否走进文学的圣坛？”客人肯定地回答我：“你本身就是一首诗，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3]50}。

如果说安子丰富的打工经验是一座沉睡的火药库，那么是客人点燃了它，让它绽放出五彩的

烟火——客人赋予这些经验以意义，并让安子明白了文学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客人的启发下，安子改写了一个打工妹的故事。她把一个高考落榜的打工妹的真实经历经过一番艺术加工，改写成一个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成长故事，并希望以此激励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也正是在客人的策划下，安子将自己过去的日记加工创作成一部纪实体小说《青春驿站》，并在深圳特区的报纸上连载。小说在当时虽不被看好，但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打工妹、打工仔们纷纷致信编辑部。据安子的回忆，当时她收到的信件有“三万多封”，多到“堆满了自己的床铺”^{[3]70}。各大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安子的影响力一下子在打工阶层当中蔓延开来，“打工明星”安子正式登场。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安子不仅被视作“打工妹的知心人”“打工作家”乃至“打工者的偶像”，还被打造成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陆续被评为“深圳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深圳市第二届文明市民”，同时当选共青团十三大代表。如众星捧月一般，安子这个名字成了打工仔、打工妹的“诗和远方”。安子的“‘打工文学’之路”在众多打工者中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他们视其为榜样，背井离乡要到深圳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后来的“打工作家”，比如王十月就是受到了安子的鼓舞，南下深圳来寻求自己的“文学梦想”。“到城里去！到深圳去！”一时成为人们心中的最强音。

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安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如其来的成功让她有些晕头转向——“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所到之处都充满了鲜花和掌声，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梦！”^{[3]75}。从1991年10月起，《深圳商报》、《女报》、《特区企业》杂志、《深圳青年》杂志纷纷开办“打工茶话”“打工信箱”“安子信箱”等专栏，纷纷邀请安子担任嘉宾主持；1992年底，安子由深圳音响公司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特区企业文化》杂志任记者、编辑；1992年到1994年间，每星期日下午的3点到4点，深圳广播电台都会播出一档由安子主持的对

① 客人，原名邱金平，安子的丈夫，客人是他的笔名。

话节目“安子的天空”^①；1998年，安子还和亿通公司合作，开办了“安子热线”。通过这些平台，安子现身说法，讲述那些属于她自己属于每一个深圳人的“成功故事”。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深圳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自强不息”。

与“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中的其他4人相比，安子可谓平平无奇。在她成为“打工作家”之前，其他4人都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写作者，这让杨宏海在为他们赋义的时候左右为难，无法协调他们之间互相冲突的文学观念。而安子的文学创作就像一张白纸，虽然稚拙简单，却适合描画最美的图画。安子虽然不是“第一代打工作家”中写作最成熟的一个，却是作品意义相对单一、最好把握的一个。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打工文学”中的安子之于杨宏海，正如延安时期^②的赵树理之于周扬。如果说，赵树理用自己的创作是在为延安文艺赋形，那么安子就是杨宏海所打造的“深圳梦”的赋形。在杨宏海看来，安子代表了“打工文学”的主旋律。与张伟明、黎志扬等人^③将“打工文学”等同于《包身工》《野麦岭》等作品，试图与“批判现实主义”或者“左翼文学”的传统来阐释现实的做法不同，安子的意义在于她以自己“挑战自我”的姿态和“自信看世界”的方式，给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以“理想”和“希望”，让他们在劳累的现实环境中找到“精神的安慰”和“心理上的平衡”，并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4]。

很明显，“安子神话”的登场得到了杨宏海等深圳市文化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在这个“童话”一般美好的故事里，一个既无学历、又无背景的外来打工妹，仅仅凭借个人的努力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千千万万打工者心中的榜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深圳当地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安子就能

凭借一己之力，整合并利用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资源，仅仅在1年时间内，从一个失业者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打工明星”，并且迅速地从“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深圳梦”的代言人。

三、“成为深圳人”

在安子的自传《圆梦深圳》一书中，她把杨宏海的“深圳梦”具体转化成“打工梦”“求学梦”“文学梦”“创业梦”“励志梦”“家政梦”“智慧梦”等7个部分。同时，这7个“梦”所代表的打工生涯又被分成了求学、创作、创业、激励等界限明晰、层层递进的4个阶段。从谋求一己的成功发展到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创办家政企业，并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而激励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如此这般，安子的打工生涯也就变成了从一个高峰向另一个高峰攀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这就不仅仅只是安子一个人的成长和财富的故事，更是千千万万深圳追梦人心底的“青春之歌”。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子以及安子的经历就是一部新时期的“成长小说”。在自传的推荐序言中，张文范就是从“成长小说”的角度评价安子的意义，并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启迪：

从“打工女皇”到“激励天后”再到“家政女神”，不断追梦之中，安子在挑战平凡，追求卓越……安子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阵痛，进行着自我调节和自我释放，在冲刷、裂变中成长，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成就自己^{[3]8}。

对于杨宏海等深圳文化工作者来说，他们倾力打造“打工文学”主要有2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以回应当时盛行的

① 这档节目原名“打工天地”，创办于1991年3月，由杨宏海与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专栏策划，曾邀请安子、黄秀萍、张伟明等6位打工者参与节目，与广大打工青年进行交流。1992年以后改由安子主持，并更名为“安子的天空”。

② 在邓小平最早对特区的设想中，深圳就被想象成一个“新时期的延安”。

③ “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中的其余4人。

“深圳是一片文化沙漠”的讽刺^①；另一方面要丰富外来务工者的文化生活，消解他们的“文化饥渴”，进而维持特区社会的稳定。杨宏海倾力将安子打造成“深圳梦”的代言人，某种意义上只是巧妙地借用了安子在打工者当中引发的“轰动效应”，安子突然的成功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而对于在这一时期进入深圳的具体个体而言，如何“挑战生活，实现自我”，或者说如何“成为深圳人”，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安子也没有答案。对于当时在打工者当中掀起的“寻找安子”的活动，安子以为那是他们在“寻找失去的自我”^{[3]30}。与其说是寻找“失去的自我”，不如说是在寻找榜样，试图打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安子正是通过不断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试图为这些寻找提供答案。因此，在安子带有自传性的写作中，她不厌其烦而又颇为自恋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成功”故事。在《都市寻梦》一书中，安子还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颇有意境的场景：

1998年的“三八”妇女节，深圳电视台专题采访我。电视台的镜头曾经定格在我大班椅后面的一张油画上。那是一个叫张雷的青年画家为我画的一幅肖像画。轮廓分明的面庞，平短的头，坚毅的眼神，背后是一片喧哗的大海。我经常望着画中的安子。画中的安子也经常望着我^[5]。

这一“自我的技术”更明显地体现在她和众多打工者之间的往来信件中。这些信件根据来源大致可以分成2类：一类是她在杂志上开辟的专栏“安子信箱”和读者之间通信往来《青春絮语——打工仔打工妹情简》；另一类是她在主持电台节目“安子的天空”时和听众朋友之间的通信集合《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

这些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件基本只向安子请教2个问题，即“怎么办”和“为什么”——这本身就是“成长小说”的基本命题：“我很不甘心又很无奈，只好冒昧请教于你，给我指点迷津”^{[6]11}，“安子，我该怎么办？”^{[6]15}“下一步我该何去何从？”^{[6]21}……它们记录的正是那些在都市历险的青年男女在工作和生活中上遇到的种种

困境。他们急切地向安子求助，这使得林祖基（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在为这本书作序时也不无忧虑，他担心“学识”和“阅历”都十分有限的安子，不足以“解答”和“应对”这些提问者的所有问题^{[6]3-4}。林祖基的担心是多余的。在大多数的来信中，写信的人更多地只是焦躁不安——为成为那个想象中的更好的自己而焦躁，为无法测定的未来而不安。面对生活中林林总总的不如意，他们心中其实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和安子一样，他们给安子写信，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画像。

安子的回信自然“投其所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她先重述一遍来信者心中对自己的期许——“从你的来信，我发现……”，并做出积极的评价；紧接着，讲述一段自己或者他人的成功经历来论证上述评价；最后，援引一段汪国真、卡耐基或者席慕蓉的箴言，直呼其名，向来信者发出成功的期许甚至挑战——“是好女孩，就要在深圳干出一番成绩来！”^{[7]22}，“安子在默默地注视着你，等待你的好消息！”^{[7]64}……来信者从安子这里寻找的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说是强烈的自我认同——“‘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道亮光：你不是神仙，不是天主，你是平凡的人，那么你的成功是平凡人的成功……这样的成功我也会得到的。’我仿佛一刹间失掉了对成功的恐惧，我仿佛得到了力量似的”^{[7]5}。“我是去年来的深圳，一向认为自己是平庸但不甘平庸的人……”^{[7]213}这是非常典型的矛盾修辞。

这是一套全新的自我认同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城市与人互相塑造、互相影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不仅诞生了诸如“炒鱿鱼”“暂住证”“职介所”“出粮”“流水拉”等新事物、新词汇，“敢为人先”“实干兴邦”“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时代的新观念，其实还有千千万万的“深圳人”——在“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一口号的召唤下，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在紧张而刺激的城市生活中，通过失望、沮丧、颓唐、内疚、反思、奋起等一系列的情感过程锻造一个个全新的

① 比如作家梁晓声对深圳的批评。

“自我”^①。但在日新月异并且以“深圳速度”号称于世的深圳,安子很快就遭遇到了个人话语的危机。

四、安子的困境

2001年7月,《深圳青年》头版头条刊登了姚中才一篇名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安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姚中才将“安子现象”比作“一个梦想的肥皂泡”,是为千千万万的打工妹、打工仔量身打造的“深圳梦”,而如今到了和这个“巨大的时代泡沫”告别的时刻^[8]。文章不仅质疑了安子的写作,认为她不过是“一书成名”的作家,而且认为她的作品充其量只是个人抒情的日记,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同为“打工作家”的张伟明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安子的不满,他认为包括《青春驿站》等在内的作品都是比较“肤浅”的“打工文学”。在他看来,安子的走红不过是“较好地利用了打工文学”的结果^[8]。曾与安子早期一起办过“半岛诗社”的作家谢宏也批评安子将文学当作“一种获利的工具”,她的写作其实和文学“扯不上什么关系”^[8]。

姚文不无犀利地指出,安子对打工妹生活的“实录”其实经过精心的剪辑。经过安子的剪裁,底层的辛苦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些“表象化的”“肤浅的”的“成功故事”。在姚中才看来,安子利用“打工文学”积累了文化资本并顺利将其兑现——“她拿着书找到了市里的领导,她明白只有这才是她的资本”^{[3]167}。她还由此牟取利益,比如求助林祖基办深圳户口,“青年十杰拉票事件”等。换句话说,大肆宣扬个人奋斗以激励世人的安子,本身并不相信个人奋斗的故事。姚中才继而发出质疑,“今天的安子还是不是打工妹们的安子?”^[8]

姚文的追问虽然尖刻,但也不无道理。安子作为“打工妹的代言人”,事实上真正从事“打

工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90年底作品见刊起,到1997年与深圳亿通公司合作开通“安子热线”为止,这7年之间,安子主要在《特区劳动报》担任记者和副刊编辑,创作了8本“打工文学”作品^②。其实很难说《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完全出自于安子之手——1992年安子开始主持“安子的天空”时,她已经雇用了50多位秘书帮助回复来信,作为“公众人物”的她已经无暇一一回复那些“雪片一样”源源不断的来信。

在安子的代表作《青春驿站》中,她就确立了故事讲述的基本原型^③,即通过讲述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为“深圳梦”赋形。她所选取的素材十分具有戏剧性——那些来自乡下的打工妹们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很快都在安子的故事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转变为都市丽人。康珍、马兰英、艾静雯、夏雪娥、郑毓秀、阿华等人一律爱情事业双丰收,她们或者选择继续留在深圳,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或者满载着从深圳学到的技术和梦想,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故乡,带领父老乡亲一同致富;就算在所难免的一小撮失败者,她们同样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添砖加瓦,经历过城市文明的洗礼,献出了无悔的青春。

“今天的安子还是不是打工妹们的安子?”姚中才的疑问其实也是安子众多读者的疑问,在与打工者往来的信件中,安子的故事也很快就遭到了质疑。比如,一位名叫董巧红的读者就来信质疑安子《青春驿站》中故事的真实性,她向安子发问“我怎么没有那么幸运呢?怎么无缘遇上客人、金甲华这样的人呢?”^{[6]216}还有打工妹写信质疑安子开出“药方”(利用业余时间深造)的有效性,一位名叫吴雨薇的打工妹就来信指出:“老板根本就不认这些(大专文凭),说这类文凭哪里都可以搜出一箩筐,再拿几张也改变不了打工妹的地位。”^{[6]39}更有打工者尖锐地指出,在深圳就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安子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建议他们去上夜校、学英

① 在《安子自传》中她引以为自己成长模板的是当时流行的美剧《欲望都市》。

② 其实这些作品主要写于1990—1994年,即担任记者和电台播音主持期间。

③ 安子后来的写作基本就沿着《青春驿站》开辟的这一方向展开,不管是看起来更像是《青春驿站》续集的《都市寻梦——安子和她的伙伴们》《人性的超越》等系列纪实类作品,还是《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等书信往来。

语，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安子自己也对此种日复一日的程式化的工作感到厌倦，毕竟打工者中的成功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来信都在倾倒苦水。终于在像雪片一般飞来的来信中，安子发现了一位名叫陈子标的打工仔的来信。这位打工仔和安子一样是少有的幸运者，他不仅在深圳安家置业，还顺利拿到了深圳户口。安子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难掩自己的激动之情：

在看了众多打工仔打工妹那满目疮痍、创痕累累的倾诉失败与苦恼的来信中突然看到一封充满成功与自豪的来信，我的心情不由自主地为之振奋，宛若漂泊太久的帆船，经过了在惊涛骇浪后突然发现进了避风港，也宛若在暗夜中行走了很久已经困饿交加疲惫不堪的人忽然发现了前方有一盏明灯，那份惊喜、那份兴奋、那份激动真是无法形容。祝贺你，一个打工一族的成功者！一个白手起家、用双手打天下的男子汉^{[7]234}。

与杨宏海在赋义“打工文学”时一度面临的话语困境相类似，安子作为“深圳梦”的代言人，在讲述自己或者他人故事的时候，也要面临同样的困境：一方面她不停地宣扬“好男儿志在四方”“搏杀才有出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深圳不相信眼泪”“不是强者莫来深圳”“人生从来无坦途，羌笛何须怨杨柳”“杀出一条血路”“每个人都可以是太阳”，等等^①，以青春的热情热烈地拥抱市场竞争，鼓励打工仔、打工妹像自己一样上夜校、学英语，以启蒙者的姿态鼓吹一条个人主义的成功之路，尽管成功者只可能是少数的幸运儿；另一方面，打工者来信中所反映的不平等的大面积存在以及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本身就是对于这一“启蒙”尖锐的质疑——繁重的劳动、频繁的失业、淡漠的人情、残酷的竞争、老板的性骚扰、工友的挤兑……安子穷于应付，只得转而宣扬某种“延迟补偿”——即失败是成功的阶梯、逆境造就人才、等待是成功的前奏——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安子强调同为打工者，只有分工的不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变革的阵痛是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她还从

民族国家的高度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打工仔和打工妹的无私奉献是深圳的一座丰碑，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

五、结 语

“打工文学”是与新时期启动的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是即将到来的城市化大潮在文学上的表征。那个被以“安子神话”赋形的“深圳梦”，背后其实是深圳这座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承诺。它不仅仅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诱惑，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即将开启的城市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文学”就不仅仅是“打工者”个人的进城故事，它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系列转变。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将书信这样一种私密的文本公开出版，本身就是一种颇具时代症候的现象。文学史上几次书信的出版都意味着文学的巨变——有的促进了新旧文学的更迭，比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信”；有的则预示着新的困境的出现和新的主体的形成，比如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登出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了呢？”。这一次打工者来信的出版，意味着“打工文学”的读者（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读者）第一次大规模地浮出水面。长期以来在当代文学中，读者一直是被想象出来的，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大鹏湾》和《佛山文艺》等“打工文学”刊物上百万册的月销售量，第一次让当代文学庞大的读者群浮出历史地表。在接下来的文学、文化生产过程中，他们将与学院派生产出来的、被认为充斥着精英趣味的“纯文学”发生饶有趣味的冲突和对话。当代文学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真正的“读者”浮出水面，这也意味着文学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出现的“打工文学”其实也是当代文学演变中十分关键的一环^②。

① 这些都是安子给打工者回信时精心挑选的标题。

② 在“打工文学”的延长线上，“网络文学”呼之欲出。

在某种意义上,“安子神话”就是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它讲述的是千千万万特区追梦人心底的故事,引发了千千万万特区追梦人的共鸣。但它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们有根本不同——林道静代表着一代人告别小我,走向大我,最终投入集体事业的时代洪流之中;与之相对的,安子们则在为那个从集体中再度挣脱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重新生成的“自我”几度欢喜几度忧。在“我”与“我们”之间,在个人主义的成功学和集体主义的事业之间,在偶像与榜样之间,它们的背后其实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安子在不知不觉中试图调动彼此冲突的两套话语去调和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不仅使得她的讲述言不由衷,而且左右为难。

姚中才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安子的结局——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安子》文章的末尾,他指出走进新时代的深圳,已经不再需要安子这样的“明星”和“英雄”,仅仅凭借热血和激情想要在深圳闯出一片天地也早已成为天真的幻想,所谓的“深圳梦”在新的时代已经有了崭新的内涵。“已经到了作别‘安子现象’的年代”,这同时也是“深圳发展与成熟的必然结

果”^[8]。其实,早在1999年左右,安子“文学梦”已经结束。与此相应的,杨宏海也宣告深圳“打工文学”已经走向了它的尾声,而下一阶段的“打工文学”故事也即将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 [1] 杨宏海. 打工世界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583.
- [2] 李小甘. 安子的天空·心有千千曲(代序)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8.
- [3] 安子. 安子自传: 圆梦深圳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50.
- [4] 杨宏海. 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 [J]. 粤海风, 2000 (6): 46-49.
- [5] 安子. 都市寻梦: 安子和她的伙伴们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2: 294.
- [6] 安子. 青春絮语: 打工仔打工妹情简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3.
- [7] 安子. 安子的天空: 打工者情简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8] 姚中才.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安子 [J]. 深圳青年, 2001 (7): 1-8.

An Analysis of “the Anzhi Myth” in “Labor Literature”

SHEN Jiangyang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abor writers”, Anzi has given shape to the “Shenzhen Dream” with the myth of her pers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dreamers” who join Shenzhen, “the Anzi Myth” means both the lure of great wealth and the newly generated “technology of self” in the market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Labor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 personal story of migrant workers “going to the city”, but also a series of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fter Shenzhen has completed its function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Labor Literature” has completed its mission at this stage, and “the Anzi Myth” has been questioned.

Key words: “Shenzhen Dream”; “the Anzi Myth”; “Labor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陈蒙腰)